

中医

存

废

之争

刘理想 著

当前，中医存废的话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深层次来说更是一个哲学问题、文化问题。

一百多年前，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门轰然打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随之在逐步丧失，出现对传统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甚至要全盘西化的地步。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自然也难逃

此厄运，废止中医的现象亦在此列。那么，现在是谁在取消中医呢？据我看来，有这么四种人用四种形式在取消中医：以科学的名义取消中医；以文化的名义取消中医；用政治权力取消中医；中医自身在取消中医。前三种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后一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

存

废

之争

刘理想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存废之争/刘理想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231-181-7

I. 中… II. 刘… III. 中国医药学—研究 IV. 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615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64405750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49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31-181-7 册数 5000

*

定价 20.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谁在取消中医？

代序

当前，中医存废的话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深层次来说更是一个哲学问题、文化问题。

100 多年前，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门轰然打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随之在逐步丧失，出现对传统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甚至要全盘西化的地步。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学自然也难逃此厄运，废止中医的现象亦在此列。那么，现在是谁在取消中医呢？据我看来，有这么四种人用四种形式在取消中医：以科学的名义取消中医；以文化的名义取消中医；用政治权力取消中医；中医自身在取消中医。前三种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后一种。

●以科学的名义取消中医

有人说：“科学只有一种，真理只有一个”，由此而推，医学科学也应该只有一个，而不应分什么中医西医。的确，真理只有一个，但是描述真理的方式方法却是多样性的，西方的科学只是其中一种。这种科学一直到 17 世纪牛顿力学之后才浮出水面。而这种科学本身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还是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数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囿于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科学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也只能是一个不断突破旧知、创造新知，拓展人类认识的无止境过程。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任何已有的科学结论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否则，科学将走向教条、谬误和僵化，最终桎梏真正的科学发展。因此科学的形式只是真理的描述法，而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

中医当然不是这种现代科学，但不是现代科学不等于没有

“科学性”。我把它称为传统科学、模型论科学，我认为科学同样是多元的，目的就是说明中医同样具有科学性！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某一种学科（例如西医）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是现代科学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实效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把判断真理的标准搞错了，这无疑是本末倒置。胡适曾说过，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仔细想想，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思维无疑是很荒谬的。

要判断中医有没有“科学性”决不能依据是不是近代科学的标准，而只能是依据实践的标准。中医的实践——临床疗效说明中医是“科学性”的，是有光明前途的。人的生命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人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绝对不可能解决生命的所有问题。中医重视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注重敏感点和关键点整体思维方式，符合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理，这恰恰是中医的优势。中医看重的是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即意象；而西医看重的是事物的形体和结构，即物象。因此在处理问题时，中医会使用意象整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整体；而西医则会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其优势在于精确。中西医的优势体现在生命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中医治病讲“和”，这是中医最大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在几千年的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它整体考虑了人的生命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人文社会属性，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科学思维，怎么能说它落后了呢？否认中医的科学性是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

●以文化的名义取消中医

从文化类型上看，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们首先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文化并不总是越来越进步的，后来的文化并不一定能超过原来的。德国现代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这样说过：“以公元前 500 年为轴心——从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

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老子、孔子、乔达摩·悉达多、亚里士多德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那个时代是文化的原创时代，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这样的轴心期，这样的文化高峰期。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现代有没有整体超过它的？所以文化进化论是有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总比旧的好”。

中医是在农耕文化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医学。我们知道，农耕文化特点是接近生活、人性化、天人合一，人是天地之一物；而工商文化的特点是重效率、重物质、重工具，人也被看成是工具。医学的本质是人文医学，以提高生命质量为关键，不是冷冰冰的纯技术。当然，现代科学技术能解决一部分疾病问题，但不可能全部解决，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生理的实体，还受人文、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现代医学在征服疾病和增进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医学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对人文文化的排斥，医学人文精神失落了。医学高科技表现出对人的异化：医学中病与人的分离、技术实体和病人客体的分离；脱离人性全面要求而形成的医患关系的简单化、医学非人格化等等。

中医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医乃仁术”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仁者爱人，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是仁的内核。在医学领域，“仁”是通过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即“术”来具体体现的。在中医看来，真正的大医应当是“仁”与“术”的结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

●利用政治权力取消中医

用政治权力取消中医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只要有疗效，老百姓就欢迎，你怎么能取消得掉？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企图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取消中医、打击中医的事例不少，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只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民国刚建立时期，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都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国元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此外，1925年，北洋教育

当局采纳废止中医派的主张，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为由未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如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并撤销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

今天，又有人利用国家征集新医改建议的机会，在网上发起有关签名活动，企图利用国家政治权力来取消中医，这与历史上那些废止中医活动如出一辙，并无多少新意。国家卫生部已经正式批评并否定了这次网络签名事件。

●中医自身在取消中医

说中医自己在取消中医，这是从中医现状而言的。几十年来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丧失了自我主体地位，具体情况从中医的教学、科研、临床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现在这种状况下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从是否把握中医精髓这个角度来看，中医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现代中医院校中医课时被压缩，中医教材的西化，培养模式的西化，目前仍是有增无减。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西医课程大量增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越来越被边缘化。在中医院校，用动物来做实验或用分子生物学等来培养造模，才是正统，而用符合中医文化特征的方法研究中医倒成了异类，传统中医反而被挤在人不欲见的偏僻角落。绝不是说不能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而是说不能成为主流以致于偏废了中医本身的方法，千万不能偏废人文科学的方法。

中医本身几千年来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然而时至今日，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去求助于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与真理性，不少人为能够带上一点科学的皮毛而沾沾自喜。中医科研往往以实验作为唯一的方法来验证中医自身的“科学性”，有些结果成了两张皮，表面上科学化了，但实质上中医的内核却

消融了。在临床上应用数百年甚至两千余年且疗效显著的药方，却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现代科技来证明它的科学性，没有科学性即使临床有疗效也是不科学的。今天中医的部分科研，一些有效中药、方剂只有经过小白鼠的点头，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这与《韩非子》的寓言“郑人买履”很相似。长此以往，中医怎么谈得上发展呢，这不是自己在取消自己吗？

●一点建议

当前最重要的事是中医在发展过程中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我认为，要想中医不被取消，最重要的必须采用系列的措施，如中医医生不许用西医西药，西医不许用中医中药！就像韩国、中国台湾那样，这样中医医生不得不用中医方法，迫使他们提高自己的理论与技能，也只有这样中医的临床水平才会越来越高。这虽然看起来有点极端，可能还要经过很大的阵痛，但是经过一个时期后，中医恢复甚至超过昔日的水平，将是极有可能的。

而现在培养出来的中医基本上是粗浅的中医和粗浅的西医相加，是非驴非马，那是什么？是骡子。骡子是没有生殖力的，是短命的。中医的发展靠这种结合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有人肯定会说，这种纯中医怎么能分配得出去？让我们看一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韩医医师地位很高，经济收入也很可观。要学韩医，分数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庆熙大学韩医学院不比汉城大学分数低。这不仅说明韩医在韩国出路，而且说明他们的对待韩医的政策是可行的，是可供我们借鉴的。

对于中西医结合这一支力量应该保留，他们对医学的发展确实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恢复建国初期的中学西、西学中，也就是说，如果中医学生想学西医，必须严格要求，必须是在学会了地道纯正的中医之后再去学西医，同样西医学习中医也是这样。这样中西医结合的学生可能就要学十年了，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才是有前途的。这是一支特殊的力量，所以要专设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师职称，只有考核合格，获得资格者，才允许既用中医又用西医来行医治病。也只有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才有可能产生医学

的突破'。

刘理想博士几年来一直对近现代史上的中医存废问题进行关注，也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现在他将中医存废的有关内容进行梳理后写成了这本书。书是采用专题的方式，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与评价，我想读者读后应该能够得到一定的启发。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此书出版之后，如果能使大家对中医存废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深入探讨中医的发展前途，那将是有益的，这也是这本书出版的由衷。我也期望着这本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张其成

2006年12月22日

[张其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是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主编、《医古文》主编。张其成教授的父母皆是全国名老中医，其家学源远流长，是著名新安医学流派“张一帖”的传人]

目 录

第一章 存废之争前的中医

- 一、中医有没有解剖学? /1
- 二、中华人文因素影响下的中医学学术特色 /7
- 三、历代中医学地位的起落及其影响 /13
- 四、近代中医医生的负面形象及其影响 /29

第二章 传统文化的近现代历程:中医存废之争的思想文化背景

- 一、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 /36
- 二、近现代几项文化举措及其对中医的影响 /41

第三章 近现代中医存废之争

- 一、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影响 /52
- 二、近代对中医的批判 /69
- 三、废止中医言论及行动 /78
- 四、从民国时期京剧的境遇谈近代名人对中医的态度 /84
- 五、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 /90
- 六、民国时期中医存废之争中的中医疗效问题 /102

- 七、对梁启超“错割好肾”事件的再认识 /109
八、近现代文化名人评判中医的言论片断
摘录 /114
九、近现代中医存废之争备忘录 /122

第四章 当代中医发展探讨

- 一、中医是科学吗? /127
二、失语的中医 /138
三、重视中医传统的必要性 /141
四、从“五老上书”论坚持中医教育的主体性 /145
五、“言必称希腊”:看看国外中医药发展状况 /152

结语

- 中医学的现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前景 /158

第一章

存废之争前的中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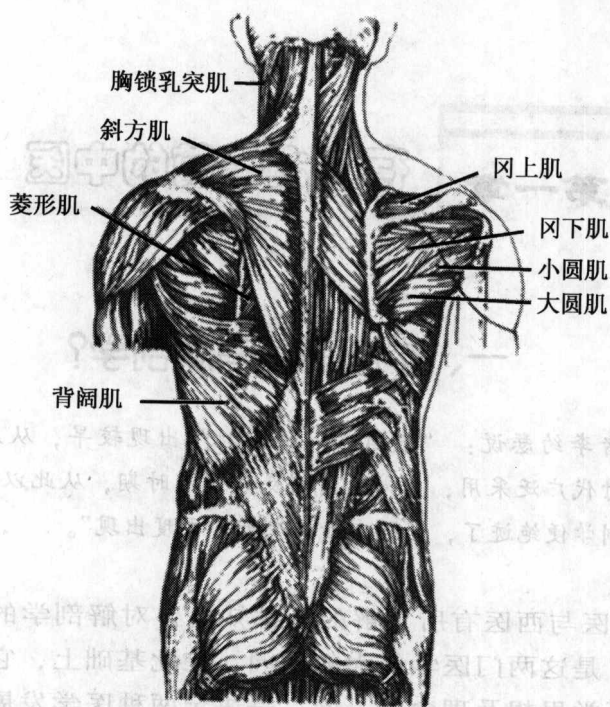
一、中医有没有解剖学？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出现较早，从扁鹊就开始了，到王莽时代广泛采用，并持续到稍晚的三国时期，从此以后，也像欧洲一样，解剖学便绝迹了，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再度出现”。

稍对中医与西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对解剖学的重视与应用的差异，是这两门医学最大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它决定了两门医学的医学思想及理念的不同，是决定两种医学发展方向的核心所在，通常所说的中医重视整体、西医偏重局部（尽管这种理解有点偏颇）亦是由此决定的。

1543年出版的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誉为科学史上两部划时代的巨著，掀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新篇章。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确立了科学的解剖学，为近代西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解剖学是推动西医学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西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以解剖学为基础，在形态决定功能观念的指导下，西医学所有相关的知识，无不以解剖学为基础，并贯穿于该知识体系各个层面的始终。如果解剖学知识发生了动摇，西医学知识体系这座大厦就会崩解。所以，从这个角度人们将西医学称为“形态医学”。

那么中医学呢？不少人认为中医没有解剖，其实不然。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医早期的发展历史，便不难发现中医本身原来是有自己的解剖学，只是由于后来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医



人体肌肉解剖图

的解剖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以至于萎缩不显，竟被后世认为中医无解剖学了。

在先秦时期，解剖作为医学临床治疗手段被应用是比较常见的，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割皮解肌，决脉解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

以中医五行配属五脏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五行观念由来已久，但五脏归属五行之法，在中医理论中却有过不小的变化，先秦至西汉中期，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引古文《尚书》也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西汉末扬雄《太玄经·玄数》也云：“木，脏脾；火，脏肺；土，脏心；金，脏肝；水，脏肾”，许翰注曰：“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这与五脏的具体解剖位置基本一致，而上述诸说，除肾属

水外，其余都与后世尊奉的五脏归属法“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不同。清末一向否定中医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将后世五脏归属法的“错误”归罪于东汉经学家郑玄（字康成），他说：“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吴汝纶《同仁会欢迎会答辞》）

《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解剖尸体，“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筴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史学家班固特笔记此事，主要是为了彰显王莽之恶，表现他的残忍，活生生地解剖了一位“复汉”的志士，但无意中却保存了医学史上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唐代的颜师古注此条说：以知血脉之原，则尽攻疗之道也。这应该是正确的理解，说明其人体解剖除了政治目的以外，另外还有为了医学研究的目的。由此，则可进一步推想汉代以前已有解剖尸体的实验，否则恐不能一步便跳跃到活人解剖的阶段。这说明那个时代的医学家确实一直在认真地追求关于人体内部构造的知识，他们当时并非毫无根据地把阴阳、五行、六气之类的观念和人体的经脉加以比附。《王莽传》的解剖实例至少使我们知道，早期的中医研究经脉也曾经过“实证”的程序。

即使到了《内经》成书的时代，对解剖方法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如《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华佗是中医历史上外科成绩比较突出的医学家，在《三国志·华佗传》中有关于他精妙外科技术的记述：“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剝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



华佗，生活于公元2至3世纪，东汉末期著名医学家。

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然而，华佗却主张不要轻易动手术，即使患者体内有需要割除的病灶。有一病案可为佐证：“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故，特意。笔者注）自剖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可见在不威胁生命的情况下，当时的医家已不积极对体内病灶轻易割除，后世中医治病往往采取保守治疗的倾向大概始于这一时期。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出现较早，从扁鹊就开始了，到王莽时代广泛采用，并持续到稍晚的三国时期，从此以后，也像欧洲一样，解剖学便绝迹了，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再度出现。”

为什么在三国时期之后，中国的解剖学便不再彰显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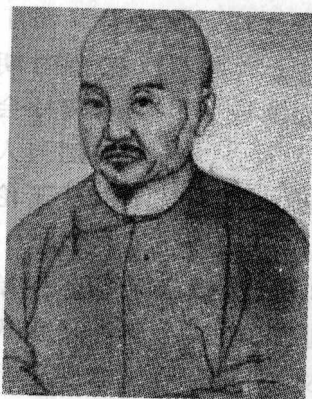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医学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它所受到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要比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大得多。医学往往以人文医学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其发展过程中，它有时被社会伦理、文化价值取向等人文因素所左右。影响中医解剖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儒家的伦理思想了。《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当然，二十四孝中的“割股疗亲”除外，那是儒家所提倡的“愚孝”）更何况是解剖人体呢？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盖先儒

持论，以戮尸为虐政，虽帝者犹有罪及枯骨之戒。医术昔又侔于贱技，其不如岐黄之剖视死者，有油然也。”自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的“仁”思想也逐渐深入人心，医学解剖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矛盾，于是不得不作出让步，科学技术服从于伦理的需要了。

南朝宋时，一个名叫唐赐的人得病，吐出蛊虫十余条，但始终不知病因所在，“临死语妻张，死后剖腹出病”，让妻子张氏在其死后解剖查寻病因。后来张氏依照丈夫的遗愿，解剖了尸体，查出了病因，但最后却被官府以“不道”罪判处死刑，理由是“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法律规定移动道路上的遗尸，都要作为‘不道’来处理，更何况是作为妻子对丈夫的遗体施行常人所不忍心做的行为？法官不应偏离正道去照顾小恩小惠，应按照大是大非的道理来裁断。唐副（唐赐的儿子）应作为‘不孝’罪，张氏要作为‘不道’罪来处理。”）。（《宋书·顾恺之传》）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正常情况下，解剖尸体是非法的，是被禁止的。除非是处决犯人以示警世的情况下，偶有解剖发生，医家也往往只是旁观，而不能亲试。如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吴简将宋廷处决的欧希范等56具尸体解剖，经由绘工宋景绘成《五脏图》；崇宁年间（1102~1106年），杨介根据泗州处死者的尸体解剖整理而成《存真图》。这样的事例毕竟是很少的，而能发生在宋代，这又与宋代统治者对医学的相对重视有关。然而这两份相对宝贵的资料，却难传后世，“今二图皆不可得见。《存真图》一卷，四库且已不着录。吾国人之不重实学，可见一斑。”（陈垣《中国解剖学史料》）

到了王清任所处的清代，王感慨古书之错误，“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



王清任 (1768~1831 年)，河北玉田县人，清代富有创新精神的医家，非常重视人体解剖学，亲自观察尸体结构，并绘图以示；临证亦颇有卓见，创造了不少补气行气、活血化瘀的方剂。著有《医林改错》一书。

夜行！”“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乃发愤著书，竟要冒着很大风险去丛冢坟墓看露脏之小儿，观菜市刑刚之逆犯，并为时人所不齿，终乃撰为《医林改错》二卷。但却为人所鄙薄，被当时医家所批评，骂之为“狂人”、“邪徒”、“杀人场上学医道”。后来随着西医的传入，西医解剖的先进，才让人看到了王清任的价值，时代的需要，“狂人”而变成了“医学的革新家”。

“可见解剖一事，数千年来原未尝绝迹，特必乘兵荒刑戮之际，而不能公然行之于平时，故能与其事者太少，遂不能互相考求，日臻精密耳”（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以致当历史进入近代时，中医解剖已近乎为零。当时的英国医生和传教士合信（1816~1873年）翻译的《西医略论》，书中有一篇“中西医学论”，在此文中合信说：“人身脏腑百体如钟表轮机，若不押开拆看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是以西国准割验死者……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精之故二也。”

由上可知，中医学有解剖的历史，也曾经有过“实证”的程序，但是最终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解剖学，更不用奢谈发展为现代科学的解剖学了。那么，缺乏解剖学系统支撑的中医，是怎样诊断疾病？又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呢？没有解剖学的中医就真的不如解剖学作基础的西医学吗？